

## 兩岸三地報紙災難事件報導研究 ——以臺灣 921 地震報導為例<sup>1</sup>

柯惠新、劉來、朱川燕、陳洲、南雋\*

---

投稿日期：2003 年 11 月 14 日；通過日期：2005 年 5 月 2 日。

\* 作者柯惠新為中國傳媒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e-mail: hxke@public.bta.net.cn；劉來為北京聯想集團研究經理；朱川燕為北京新生代市場監測機構研究經理；陳洲為北京美蘭德媒體傳播策略諮詢有限公司研究經理；南雋為新華社新聞研究所助理編輯。

## 《摘要》

本文以內容分析法分析中國大陸、香港與臺灣三地六份報紙於臺灣 921 地震期間對地震及與地震有關之報導。研究發現：若以相對報導量衡量，則三地報紙之變化趨勢具有一致性；若以絕對報導量比較，則三地報紙變化差異很大，且對臺灣 921 地震的關注點與報導形式也隨時間有異，但三地報紙的變化規律並不一致。究應採用什麼指標來研究新聞媒體對災難事件的關注變化，本文提出了思考。

關鍵詞：地震報導、災難、危機傳播、內容分析

## 壹、研究緣起

1999 年的臺灣 921 大地震曾經引起兩岸三地之媒體共同關注，相關報導占有大量報紙版面。兩岸三地都是華人社會，有著共同文化血脈與日益密切的政治、經濟、社會聯繫，若一地出現災難或重大新聞事件，往往立刻引起另外兩地社會與媒體高度關注。因此，九二一大地震提供了一次對相近文化背景、不同媒體管理機制、不同輿論機制之災難報導進行比較、研究的好機會。相關研究曾對臺灣 921 地震的報導進行內容分析，但研究範圍多侷限於臺灣一地，兩岸三地媒體報導之系統比較與分析則付之闕如。基於此點，本研究小組於 2000 年<sup>2</sup> 成立後，即於同年末在香港與臺灣同行協助下，針對兩岸三地的六份報紙進行了抽樣內容分析，期待研究成果可豐富兩岸三地對災難報導的研觀察與瞭解。

簡單來說，本研究嘗試比較三地媒體對同一災難事件的報導，藉以揭示差異並分析產生差異的可能原因。分析重點在以下幾個方面：

- (一) 兩岸三地報紙對臺灣地震的報導量隨時間推移如何變化？
- (二) 兩岸三地報紙對臺灣地震的報導關注點是否有所差異？若有，這些差異如何展現？
- (三) 兩岸三地報紙對臺灣地震的重視程度是否有所差異？若有，又是如何展現？

我們另也關注，究竟何種報導角度與報導量方屬合適？媒體何時減少報導量較為恰當？以何種方式轉移關注點更能收到較佳的危機傳播效果？若能發現災難報導在報導量、報導主題、報導方式上的變化規律，對於新聞實務也應有參考價值，並能協助政府正確認識媒體在災難中之

角色與作用，為「危機傳播」(crisis communication)提供決策依據。

## 貳、文獻綜述

「災難是一個發生於特定時空的社會事件，對社會或該社會的某一自足 (self-sufficient) 區域造成嚴重損壞，招致人員及物質損失，以致社會結構瓦解，無法完成重要功能或工作」(臧國仁、鍾蔚文，2000: 145)。

西方學者將災難分為兩類，一類是天災 (natural disasters)，包括地震、水災、暴風雨、雪崩、旱災與泥石流等；另一則是人禍 (technological disasters)，如墜機、爆炸、戰爭與核能輻射外洩等。這些災難有些可以預測 (如颱風、戰爭)，有些則事發突然難以事先掌握，如地震、墜機等事件 (蘇蘅，2000)。然而無論何種災難，其所造成的嚴重損害不僅破壞社會結構，也增加公眾對環境的不確定感，易於引起恐慌和混亂。為了減少災後恐慌及混亂並避免損失，危機傳播研究正日益受到各國政府與學者的重視。

美國國家研究理事會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將危機傳播定義為：個體、群體與機構之間交換資訊與看法的相互作用過程。<sup>3</sup> 媒體在此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危機傳播文獻中已有相當多討論 (Kreps, 1979; Nigg, 1982; Yankelovich, 1991)，主要重點為：媒體是災難發生後形成公眾認知的重要資訊來源，在災難發生各個階段皆發揮傳播資訊的重要作用，可概括分為告知 (awareness)、預報 (prediction)、影響 (impact) 與結果 (aftermath) 等。媒體且為公眾及時提供有用且真實的資訊是媒體最主要的作用，其如何描繪危機及災難的可能後果，影響公眾的看法及其受新聞影響而產生的行為。

然而危機傳播研究者也注意到，媒體在災難發生後所扮演的角色有時未必符合危機傳播管理者（政府或社會組織）的期待。畢竟新聞記者並非教育者，教育大眾也不是新聞記者的基本角色，因此，媒體常粗略地報導某件事，對議題處理的複雜過程鮮有助益。對危機傳播的研究者而言，戲劇性似乎才是新聞報導的支柱，這種風格與真正的危機傳播關係並不緊密。換言之，媒體傾向於凸顯當下的關注點、不確定性與衝突，鮮少質疑任何消息來源的正確性，且對所有消息來源等量齊觀。媒體在危機事件的報導角色甚至可被視為是「不加判斷」，提供資訊給公眾之前幾乎沒有技術上的精確度分析，此乃因媒體報導較易受到罕見、新奇與商業發展的新聞價值驅使，而非對危機之即時評估。在這些研究基礎上，危機傳播研究者指出，若欲發揮媒體在危機傳播中的正面作用，則應根據媒體特性制定相應策略（Chartier & Gabler, 2001）。

蘇蘅（2000）曾對臺灣八大媒體組織的臺灣 921 地震報導運作機制進行深入探討，也提到媒體與政府的互動問題。她認為，救災中浮現的政府與媒體相互指責情況原因常出於「政府似不瞭解不同媒體的特性，也不清楚媒體競爭新聞、求好心切的本質，更忽略作為社會神經網路的媒體，在災變中必須與社會脈動緊密相合，從頭到尾關注政府及各界的救災行動，並持續對後續龐大資源的配置保持高度警覺，才能發揮看門作用」（p. 160）。

因此，媒體如何報導災難事件？有何規律？這些問題不僅為新聞研究者所關注，也能幫助政府與各種組織瞭解媒體特性，為危機傳播中的公關策劃提供決策依據。

中國大陸對災難報導的研究可說是仍處於起步階段，專著研究僅散見於一些相關新聞學書籍中。例如，顧理平（2002）所著《社會新聞採寫藝術》中有一章專論「災禍新聞採訪」，杜駿飛與胡翼青（2001）所

著《深度報導原理》中則有小部分涉及「深度災難報導」，而新聞傳播學各類學術期刊（如《現代傳播》、《中國記者》、《新聞愛好者》、《新聞分析稿》）有關災難報導的討論文章不足百篇，主要可分成以下兩類，且其中第一類佔絕大部分：

- （一）經驗性地總結或對某次災難報導加以評論，內容多從具體的災難事件著眼，分析該災難事件的媒體報導經驗與報導手法，如〈從 98 抗洪<sup>4</sup>報導談災害新聞的採訪與寫作〉（劉勁松、劉偉，1998: 18-19）與《人民日報》編輯部（1998）的〈為抗洪鬥爭提供強有力的輿論支援——人民日報抗洪搶險宣傳報導總結〉等；
- （二）從具體新聞實務與報導機制角度探討如何報導與管理災難報導，如〈關於災難新聞報導的角度選擇〉（欒軼玫，1997）、〈抗洪救災攝影採訪得失談〉（周朝榮，1999）、〈關於重大自然災害深度報導的思考〉（曹麗坤、程秋，2000）、〈試論九十年代中國災難報導機制〉（劉一平，2001）以及〈從「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國災害報導觀念變化分析〉（孫發友，2001）等。

上述這些研究都較為具體，從採訪、角度選擇等微觀層面著手。此外，有相當數量的研究另從人文主義、新聞美學、新聞心理學、政治傳播學等角度審視災難報導。在一些傳播學的學術網站也尚有一些評論涉及災難報導，包括網友評論，雖非正式論文卻仍有深度。

中國大陸較為系統地針對災難報導所進行之研究有三項，分別是武漢大學張勇（1999）的碩士論文《當代中國災害報導研究》、廣西大學張述亞（2002）的碩士論文《災難新聞報導初探》、中國人民大學鄧利平（2001）的博士論文《負面新聞資訊傳播的多維視野》。在前兩篇論文中，作者們經由分析、比較中國古代與近代的一些災難報導，總體勾勒出災難報導之發展脈絡在大陸缺乏相關具體理論支持的現狀，但仍對

災難報導的實務提出具有價值的建議。至於第三篇論文則把研究視野置於比災難報導更廣闊的負面新聞資訊中，運用新聞學、傳播學、政治學、倫理學與社會心理學等多學科原理深入探討負面新聞資訊傳播的歷史與政治影響、倫理道德、大眾審美間的關係，並另涉及負面新聞資訊的內涵、特徵與傳播功能。

以上這些論文主要採用質性研究方法，從微觀到宏觀角度探討災難報導之媒體角色與表現，絕大部分針對媒體的報導方式進行研究，所依據的理論主要是新聞實務經驗與報導原則，較少以西方大眾傳播相關理論為研究架構，也未以危機傳播角度分析災難報導。

西方學者對於災難報導的研究起步較早，研究視野開闊，研究方法也較多元，既有質性也有量化研究。以一個報導手法方面的研究為例，同樣是研究如何報導災難，大陸常從質性的描述與經驗總結出發，而 John McClure, Michael W. Allen 與 Frank Walkey (2001) 三位心理學者則採實驗法研究新聞報導中有關地震破壞原因的資訊對受眾的影響。其實驗結果發現，不同資訊方式影響受眾對地震破壞的歸因，此一結果不僅對記者的災難報導手法具有參考價值，且對政府與社會團體的防災教育與危機傳播也提供具體建議。此外，更多災難報導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此乃因內容分析不僅準確回答「媒體如何報導災難」等問題，且能揭示媒體進行災難報導的規律。

早在 1950 年代，美國學者就用內容分析法研究報紙如何報導颶風為德州所帶來的災難 (Moore & Williams, 1958)、Nimmo 與 Combs (1985) 曾分析美國三大電視網如何報導災難事件、日本學者 Oda (1996) 也分析過阪神大地震的報導內容。美國傳播學者 Singer 與 Endreny (1993) 的研究則將內容分析法發揮得淋漓盡致，在前人基礎上對災難報導進行清晰定義與全面分類，根據災難類型而將災難報導分

為七類，並從媒體凸顯與忽視的災難類型、災難發生的地理位置、有關災難的資訊、譴責、災難報導的消息來源、媒體報導災難的準確性等層面，對災難報導進行全面且深入的比較探究。Singer 與 Endreny 從 15 種媒體在 1984 年的報導中抽樣四個月，並由四種媒體在 1960 年的報導中抽樣四周，以對其中的災難報導進行內容分析。其主要發現有：（一）媒體通常不會在某一災難事件發生前報導有關的預警消息，災難發生後相關報導量往往在短時間內大幅減少，表示媒體通常不太關注災難引發的安全問題是否已徹底解決（pp. 22-23）；（二）將近一半的災難報導沒有涉及有關災難的指責與責任，而指責的形式則與災難的類型有關（p. 108）；（三）災難報導引用最多的消息來源是政府官員（p. 130）。

Singer 與 Endreny（1993）的發現為後續研究留下了可資延伸的模式，而臺灣一些災難報導研究與結果似也與其研究發現類似。例如，在報導量的研究上，陳鳳如（2001）分析臺灣 921 大地震的報導情況，發現地震發生後第一周的報導量比第二周的報導量多。胡幼偉與陳嘉彰（2002）分析 2001 年之颱風報導形態時，也發現在颱風遠颶兩周後，媒體就不再關注颱風引發的各項安全議題；上述不同研究的相似結果，似乎顯現了媒體災難報導的一些普遍規律。

雖然有關災難報導的研究論文較為常見，但使用內容分析法研究臺灣 921 地震報導的論文卻仍較少。前述陳鳳如（2001: 82-84）分析《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中央日報》四報對 921 大地震的報導情況，除了報導量外，其主要研究發現有：（一）報導量的變化可能與災難延續時間、災難嚴重性、死傷人數與財物損失有關，而非媒體因素；（二）報導方式以一般報導與照片為主，報導主題主要為「救援及善後行動」及「災因與傷亡損失等檢討」，在「防災及宣導活



動」的報導量較少；報導主角以政府當局及社會各界人士為主；報導偏向以中立為多，其次為正面報導，負面報導很少；（三）九成以上的報導「無責怪對象」，而責怪對象以中央政府為多；（四）消息來源以「報社或記者本身」所佔比例較高，其次是「政府官員」與「民間團體」，而專家學者的專業意見較不受重視。最後，該研究發現，災難報導之內容係以與「人」有關者為重點。

有趣的是，陳鳳如（2001）有關責怪對象與消息來源的研究發現與 Singer 與 Endreny（1993）有所差異，這種差異究竟來自研究範圍之不同（陳鳳如研究的是地震報導，而 Singer 與 Endreny 研究對象包括地震報導在內的災難報導），還是來自抽樣分析的差異，顯然需要更多災難報導的內容分析才能進一步探討。

本研究所採用的不是中國大陸災難報導研究常用的質性研究模式，而是以內容分析法比較中國大陸、香港與臺灣兩岸三地報紙於 921 地震報導上的異同，希望藉由量的分析對不同新聞體制下的兩岸三地媒體報導能有較為客觀、準確的異同比較，藉此彰顯災難報導背後的新聞規律。

基於比較需要，本研究採用與美國 Singer 與 Endreny（1993）及臺灣陳鳳如（2001）等類似的分析框架，同樣關注媒體災難報導量的變化，但在報導量的分析上，本研究提出了「相對報導量」此一新的指標。我們認為，報導數量的絕對值不利於不同地域或不同種類的媒體間的比較，更無法衡量同一媒體上的重要性排序。例如，臺灣與香港報紙都是「厚報」，每天出刊都在 40 版以上，香港《東方日報》更經常突破 100 版。大陸《人民日報》卻是「薄報」，每天最多不過 12 版，從每日報導新聞則數來看，《人民日報》也比臺灣、香港的報紙少得多。因此，僅用每日各媒體報導災難事件的絕對則數加以比較關注程度並不

妥當。若採相對報導量，則可避免因各媒體報導容量之不同所帶來的影響。所謂相對報導量，即指任一媒體之報導則數佔當天所有新聞報導則數之比例，其數值反映了某議題在該媒體當天所有議題中之比重。

因此，本研究將同時檢視絕對報導量與相對報導量，其操作性定義如下：

絕對報導量：一定時期內之某目標媒體相關新聞報導則數之總和。

相對報導量：一定時期內之某目標媒體相關新聞報導則數佔該媒體同時期所有報導則數之百分比。

本研究將觀察重點放在災難報導相對報導量的變化，並綜合分析量的變化與媒體對災難的關注點和關注度的變化，試圖描繪媒體災難報導的變化過程及其規律。由於災難報導往往是電視與報紙的影響較大，考慮研究具體實施之難易度，本研究乃選擇報紙進行分析。

## 參、研究方法

### 一、分析樣本

#### (一) 時間段的選取

本研究以 1999 年 9 月 16 日至 10 月 15 日一個月的報紙作為分析時間範圍，包括地震前一周與地震後三周，可以比對震前與震後的報導。另外，此期間正逢華人傳統節日中秋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日、臺灣的雙十節，可同時考量節日報導是否亦受地震報導的影響。

#### (二) 報紙的選取

由於三地報紙種類繁多，考量各方面之條件限制，我們決定在三地

各選兩份具有代表性且發行量大的綜合性日報，分別是：大陸的《人民日報》與《北京青年報》、臺灣的《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張毓麟，2003）、香港的《東方日報》與《明報》（人民網，2003）；香港和臺灣兩地報紙的選擇曾諮詢過港臺新聞學專業的相關教授與學生，這六份報紙的基本情況如下：

1. 《人民日報》：中國大陸第一大黨報，日發行量超過一千萬份；
2. 《北京青年報》：中國大陸最具影響力的官辦都市性報紙之一，日發行量約 65 萬（2000 年資料）；
3. 香港《明報》：香港最具影響力的報紙，有人將它比喻成香港的《泰晤士報》，日發行量約十餘萬份，讀者對象包括大學與中學生在內的知識階層；
4. 《東方日報》：香港日發行量最高的兩家報紙之一，約為 30 餘萬份；
5. 《中國時報》：臺灣傳統兩大報系之一，<sup>5</sup> 日發行量超過一百萬份；
6. 《自由時報》：臺灣發行量最大的三家報紙之一，日發行量超過一百萬份；

本研究總樣本有六種報紙，每種報紙分析 30 天，故共分析 180 期報紙。

### （三）版面的選取

由於報紙版面眾多，本研究關注的地震報導基本上集中於各報的硬性新聞版面（如要聞版、綜合新聞版、國際新聞版、社會新聞版等）。限於時間與人力，本研究並未納入軟性版面如副刊、消費、家庭、醫

藥、休閒、電腦、電影、房地產等。

## 二、類目的建構

在分析內容的類目建構上，本研究參考王石番（1991）《傳播內容分析法—理論與實證》中有關報紙內容分析的方法，以及翁秀琪（1993）《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的研究實例〈傳播內容與社會價值變遷—以報紙對勞工運動的報導為例〉，並考慮本次與未來研究的需要，分析類目包括報導量、關注點及重視程度三部分，分別說明如下：

### （一）報導量

1. 災難報導量：每份報紙每日災難報導的則數。
2. 所有報導量：每份報紙每日所有新聞報導的則數。

### （二）報導的關注點

1. 報導主角：包括「黨政官員、機構」、「社會團體、學術機構、工商企業」、「媒體」、「國際組織」、「救災者」、「災情」、「受災者及家屬」、「一般個人」以及「其他」等項。
2. 報導主題：包括「災情」、「受災感受」、「慰問與救災」、「大陸、香港援助與活動」、「重建」、「原因與影響」、「海外救援與評論」、「批評」以及「其他」等項。

### （三）報導的重視程度

1. 版面編排：包括「上」、「中」、「下」、「特殊編排（如全

版、半版與通欄)<sup>6</sup>」

2. 報導型式：包括「純淨新聞」、「特寫」、「評論」以及「其他」等項。

### 三、信度檢驗

在確定分析類目後，本研究的六名編碼員針對同樣的 30 篇報導進行兩次前測編碼，其中第二次前測乃根據第一次前測結果經調整部分類目後進行，六名編碼員的平均相互同意度為 .853。

### 肆、研究發現

本研究以時間為軸，分析大陸、香港、臺灣兩岸三地報紙對臺灣 921 地震報導的報導量、關注點、關注度等隨時間變化的情況，資料分析結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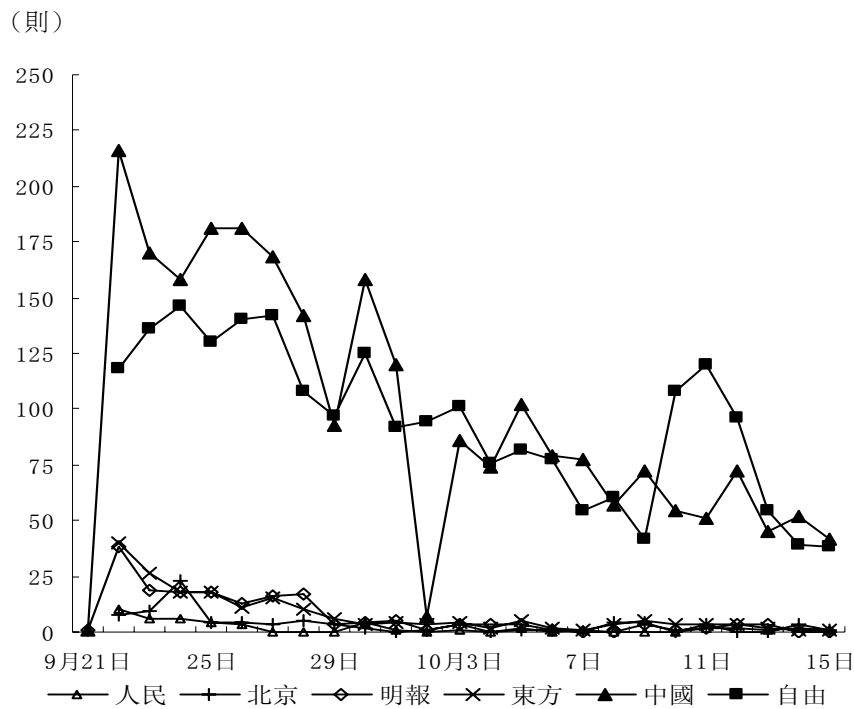
#### 一、兩岸三地報紙對 921 臺灣地震的報導量

由絕對報導量來看，大陸與香港關於台灣地震的報導量在短期內銳減。臺灣報紙關於地震之報導量雖也隨時間變化降低，但降幅較小，以相對報導量觀之，這種銳減情形則較不明顯，各報在地震發生後的一段時間內都有一個相對報導量保持平穩的時期，三地媒體的變化規律較為一致。

Singer 與 Endreny (1993) 指出，新聞媒體對災難事件的報導數量會在短時間內銳減，但他們認為「這並不表示災難引發的安全問題已解決，而是因為災難事件沒有更新的進展，新聞媒體就將時段或版面騰

出，以報導更具新聞價值的事件，或追逐更新鮮的新聞話題。這種對災難新聞的處理方式，已成為一種常見的報導模式」(pp. 22-23)。胡幼偉與陳嘉彰(2002)及陳鳳如(2001)等研究者也發現，災難事件發生一段時間後相關的報導量會減少。兩岸三地的報紙對 921 臺灣地震的報導是否也有類似表現呢？本研究對兩岸三地報紙對 921 地震的報導量進行了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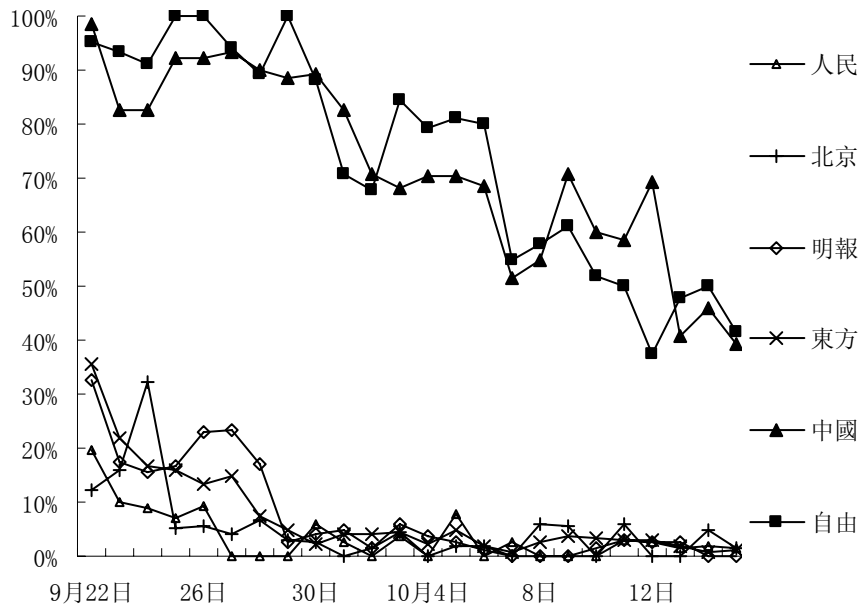
上述 Singer 等研究者的發現，乃針對媒體每日報導災難事件的新聞則數而來。本研究同樣也對六份報紙每日報導地震的新聞則數，即絕對報導量進行分析，此結果見圖一。



圖一：兩岸三地 921 報紙地震絕對報導量之變化

從三地報紙報導量的變化來看，大陸與香港關於台灣地震的報導量的確在短期內銳減：大陸兩份報紙的地震報導在 9 月 25 日減到 5 則以下，香港兩份報紙的相關報導在 9 月 24 日降到 20 則以下，9 月 29 日則降到 10 則以下。臺灣報紙關於地震新聞的報導量雖然也隨時間變化降低，但降幅較小。三地報紙地震報導量的差異可能與接近性有關：地震發生在臺灣，因此臺灣媒體更加關注，報導量高居不下，量的下降也較為緩慢。

若以相對報導量來比較各媒體對 921 地震的關注度，如圖二可看出，地震發生後的次日到三周後，臺灣報紙中地震新聞佔所有報導的比例遠高於香港與大陸的報紙，同樣說明由於接近性的緣故，臺灣報紙對於地震的關注度比香港和大陸為高。



圖二：兩岸三地報紙 921 地震相對報導量之比較

以絕對報導量進行比較時發現，大陸與香港報紙的報導量的確出現如 Singer 與 Endreny (1993) 所提到的短期內銳減情形；但若以相對報導量比較，這種銳減則不顯著。各報在地震發生後都有一個相對報導量平穩的時期，顯示媒體的關注度並未迅速減低。臺灣兩份報紙有關地震的相對報導量從 9 月 30 日（即地震發生後第 11 天）開始減少，直到 10 月 15 日（即地震發生三周後）兩報仍有 40% 的新聞與地震相關。香港兩份報紙關於地震的相對報導量從 9 月 28 日開始減少，大陸《人民日報》關於地震的相對報導量由 9 月 27 日開始減少，《北京青年報》則由 9 月 25 日開始下降，俱都顯示雖然接近性使臺灣報紙對地震之報導量<sup>7</sup>與香港、大陸報紙對地震的報導量出現較大差異，但關注度隨時間所發生的變化規律卻具一致性。

絕對報導量和相對報導量間的差異，從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前述 Singer 與 Endreny (1993) 的論點，即災難新聞之絕對報導量經歷一段時間後會有銳減的情形。而從相對報導量來看，媒體議題的變化雖較緩慢，仍持續保持對該事件的關注，尤以災難發生地的媒體最為明顯。從危機傳播角度來看，這也說明在災難發生地的媒體往往需要更多時間進行危機傳播中的持續報導溝通以掌握議題建構權力；相較之下，非災難發生地的媒體對災難事件的關注持續性則低。

## 二、兩岸三地報紙對 921 地震的關注點

三地報紙對地震的報導主題主要集中於「慰問與救災」，臺灣媒體較為關注「黨政官員、機構」，大陸媒體較為關注「社會團體、學術機構」，香港媒體較為關注「受災者及其家屬」，並存在報導主角與主題較多現象。三地報紙不同主題的報導量都隨時間發展而有變化，但三地



變化趨勢不同，且關注點均在第二周發生較大的變化。

兩岸三地報紙提供何種資訊給讀者？報導哪些人或事？這些人或事的哪些方面是媒體報導所關注的？本研究從報導主角與主題兩個層面針對三地報紙的地震報導進行分析。

由報導內容觀之，大陸報紙最常以「社會團體、學術機構」為報導主角（47.1%），而臺灣（78.0%）與香港（72.4%）報紙則多以「黨政官員、機構」為報導對象。此外，香港報紙的地震報導有 44.3% 以「受害者及其家屬」為報導主角，而大陸與臺灣此一類目的報導比例僅及香港的一半左右（分別為 22.1% 與 21.6%）。從合計百分比來看，香港報紙地震報導之各種主角所佔比例為 207.6%，這說明香港報紙中的地震報導常有兩個以上的關注點，此是否意味著香港媒體在「與其他各個可靠的資訊來源協調配合，以爭取多元聲音與多方支持」之方面表現較佳？值得進一步觀察。大陸媒體由於政治背景等原因，對臺灣黨政官員報導有侷限，故使大陸新聞中的主角略顯集中和單調（詳見表一）。

表一：兩岸三地報紙 921 地震報導主角之比較 (%)

報導主角	三地報紙			合計 (N = 1,045)
	大陸 (N = 136)	香港 (N = 210)	臺灣 (N = 699)	
黨政官員、機構	19.1 (26)	72.4 (152)	78.0 (545)	69.2 (723)
社會團體、 學術機構	47.1 (64)	27.6 (58)	21.5 (150)	26.0 (272)
媒 體	7.4 (10)	4.3 (9)	5.6 (39)	5.6 (58)
國際組織	0.7 (1)	9.0 (19)	3.3 (23)	4.1 (43)
救災者	0.0 (0)	11.9 (25)	8.6 (60)	8.1 (85)
災情、建築等 客觀事物	8.8 (12)	24.3 (51)	6.0 (42)	10.0 (105)
受災者及其家屬	22.1 (30)	44.3 (93)	21.6 (151)	26.2 (274)
一般個人	18.4 (25)	13.8 (29)	13.4 (94)	14.2 (148)
其 他	0.0 (0)	0.0 (0)	0.3 (2)	0.2 (2)
合 計	123.5 (168)	207.6 (436)	158.2 (1,106)	163.6 (1,710)

註：括弧內的數字為類目編碼的次數。由於一篇報導中的主角有時會多於一個，此題編碼時允許編碼員為一則新聞編多個碼，故合計之列百分比超過 100%。

多主角的報導是否也伴隨著多主題呢？以下對三地報紙地震報導的主題加以比較。

從表二可看出，香港報紙各類主題佔地震報導的次數百分比合計為

225.5%，顯示香港報紙平均每個地震報導有 2.25 個主題。偏重報導主角與主題的現象究竟是香港報紙對臺灣地震報導所表現的特點，還是對所有新聞報導的共同特色？值得未來進一步探索。

表二：兩岸三地報紙 921 地震報導主題之比較（%）

報導主題	三地報紙			合計 (N = 1,018)
	大陸 (N = 137)	香港 (N = 216)	臺灣 (N = 665)	
災 情	27.7 (38)	21.3 (46)	10.8 (72)	15.3 (156)
受災感受	2.2 (3)	37.0 (80)	4.5 (30)	11.1 (113)
慰問與救災	66.4 (91)	74.1 (160)	91.3 (607)	84.3 (858)
大陸、香港援助	5.1 (7)	8.3 (18)	1.7 (11)	3.5 (36)
重 建	9.5 (13)	12.5 (27)	26.3 (175)	21.1 (215)
原因與影響	32.1 (44)	26.4 (57)	20.6 (137)	23.4 (238)
海外救援與評論	0.0 (0)	12.0 (26)	3.9 (26)	5.1 (52)
批 評	5.1 (7)	23.6 (51)	17.9 (119)	17.4 (177)
其 他	0.7 (1)	10.2 (22)	0.6 (4)	2.7 (27)
合 計	148.9 (204)	225.5 (487)	177.6 (1,181)	183.9 (1,872)

註：括弧內的數字為類目編碼的次數。由於一篇報導中的主題有時會多於一個，此題編碼時允許編碼員為一則新聞編多個碼，故合計之列百分比超過 100%。

此外，三地報紙對地震的報導主要集中在「慰問與救災」主題，如臺灣報紙中以此為主題的報導量佔當地地震總報導量的 91.3%，香港報紙佔 74.1%，大陸報紙佔 66.4%。從前述報導主角的分析中我們曾經發現，香港報紙以「受害者及其家屬」為報導主角的比例遠高於臺灣、大陸兩地報紙，而從報導主題的分析上也發現，香港報紙比大陸與臺灣的報紙更加重視對民眾「受災感受」的報導，以此為主題的報導量超過香港報紙地震總報導量的三分之一（37.0%），而大陸和臺灣分別只有 2.2% 和 4.5%，似乎顯示香港報紙的地震報導較具「人情味」。

至於提供災情資訊的「災情」以及「原因與影響」等主題則較受到大陸報紙重視，有 27.7% 的報導都以「災情」為主題，32.1% 的報導則為「原因與影響」。香港報紙這兩類報導所佔比例分別為 21.3% 和 26.4%，臺灣報紙為 10.8% 和 20.6%，都較大陸報紙比例為低。

分析三地報紙地震報導的報導主角時發現，臺灣與香港兩地報紙多以「黨政官員和機構」為報導主角，此是否意味兩地的關注點較為接近？表三則進一步呈現兩地報紙以「黨政官員和機構」為報導主角的地震新聞主題分佈，結果發現臺灣與香港的此類報導在主題上仍存在明顯差異：香港報紙有 22.7% 的主題與「受災感受」有關，而臺灣此類報導僅佔 0.9%；另一方面，香港報紙的 10.1% 報導係以「大陸、香港援助」為主題，16.8% 以「海外救援與評論」為主題，而臺灣相關報導所佔比例僅分別為 0.2% 和 2.4%。此外，由於臺灣大地震事發突然，各方面應對措施不足，民眾、政府、政黨及媒體都會有不同指責與抱怨，香港媒體更因香港救援隊赴台受到冷淡，而對臺灣有關部門大加指責（肖小穗，2002）。這些指責、抱怨也反映在港臺兩地的報導主題上，故香港報紙高達 39.5% 的報導以「批評」為主題，而臺灣報紙以此為主題的報導亦有 18.3%。

表三：港臺報紙以「黨政官員和機構」為報導主角的 921 新聞主題分佈 (%)

報導主題	臺灣	香港
災 情	6.6 (30)	15.1 (18)
受災感受	0.9 (4)	22.7 (27)
慰問與救災	109.8 (503)	112.6 (134)
大陸、香港援助	0.2 (1)	10.1 (12)
重 建	28.6 (131)	14.3 (17)
原因與影響	16.2 (74)	20.2 (24)
海外救援與評論	2.4 (11)	16.8 (20)
批 評	18.3 (84)	39.5 (47)
其 他	0.4 (2)	9.2 (11)
合 計	183.4 (840)	260.5 (310)

註：括弧內的數字為類目編碼的次數。由於一篇報導中的主題有時會多於一個，此題編碼時允許編碼員為一則新聞編多個碼，故合計之列百分比超過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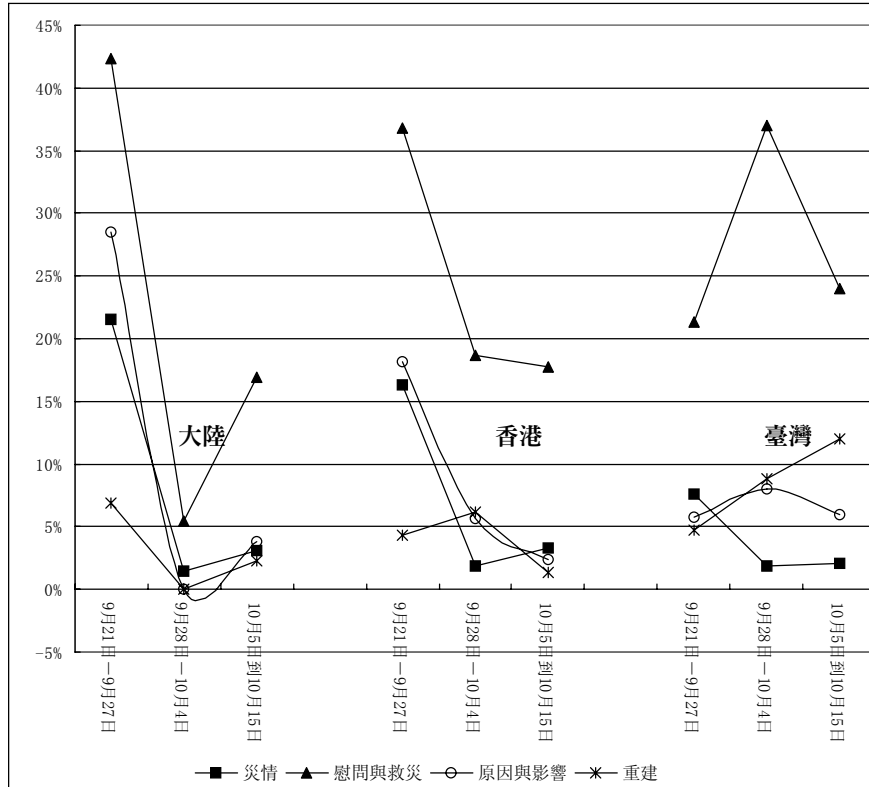
以上分析顯示，三地媒體在危機溝通的前兩個重要步驟「蒐集事實真相」與「儘快披露」之整體表現不錯。雖然三地媒體都重視「慰問與救災」，但報導的「事實真相」卻各有所偏重。具體來說，大陸媒體偏重於提供「災情」與「原因與影響」，這可能是因為大陸並未直接受到地震災害，故較重視「解釋」層面。香港媒體則對災情細節與受災者較

為關注，而臺灣因係災難發生地，對「慰問與救災」最為重視。由此可知，三地媒體對災難的不同心理距離也體現在報紙隨時間變化的地震報導關注度上。

在上節分析中我們發現，9 月 30 日是臺灣報紙地震報導量明顯減少的轉捩點，此後報導量所佔當日總新聞量比例皆降到 90% 以下；10 月 6 日則是另個轉捩點，此後臺灣報紙的地震報導量比例均降到 70% 以下，此點與陳鳳如（2001）的研究發現有類似結果。然而不同主題的地震報導量是否也呈現類似變化呢？本研究參照表二的分析結果，選取了兩岸三地報紙報導量較大的四類主題以比較災後報導關注點的變化情況，分別是「災情」、「慰問與救災」、「原因與影響」及「重建」，分析時段為地震發生後的第一、二、三周，即 9 月 21-27 日、9 月 28 日至 10 月 4 日、10 月 5-11 日（詳見圖三）。

從三地報紙地震報導關注點的變化可看出，三地報紙不同主題的報導量都隨時間而有所變化，但趨勢有所不同。臺灣報紙對「慰問與救災」的關注度一直較高，報導量在第二周即達到高峰（37.0%）。以「重建」為主題的報導量則在第二、三周持續增長，「災情」報導則以第一周最多，第二周報導量明顯降低；以「原因與影響」為主題的報導在災後三周內的報導量變化幅度不大。

至於大陸報紙中四類主題的報導量變化趨勢基本上一致，即在災後第一周報導量最高，第二周（即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 日）下降至最低，第三周略有增加。大陸報紙的相關報導何以皆有下降？可能與此段期間對國慶日的報導量增加有關。而香港報紙除了「原因與影響」在第二周有所增長外，其他三類報導都逐周遞減，尤以第二周減幅最為明顯，不過「慰問與救災」在第三周仍保持較高的報導量。整體觀之，三地媒體報導的關注點均在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周有較大變幅。



圖三：兩岸三地報紙 921 地震報導關注點的變化

註：此圖根據每一主題該時段的報導量於當地報紙地震之總報導量中所佔比例所做。此一比例可直接衡量該主題報導量的相對大小。

與大陸、香港報紙相比，臺灣地震報導關注點的變化有其特殊性，顯與其為地震發生地有關。在納入分析的這四個主題中，臺灣報紙的「災情」報導量第一周排在第二位，第二周即降至第四位，取而代之的是「重建」的報導，此變化與災後工作的發展一致：地震發生後，民眾首先需要瞭解的有關震災的資訊，因此報導「災情」較多。災難帶來短

暫混亂結束後，政府與受災者都會把注意力轉移到災後重建上去，因此報紙對「重建」的報導會增加。這表明臺灣報紙的地震報導在提供民眾所需資訊方面是隨著需要的變化而轉變的，但是地震報導是否滿足民眾的需要？滿足的程度如何？則須根據當時的民意調查與報導的文本分析結果才能解答。

### 三、兩岸三地報紙對 921 臺灣地震的重視程度

從對地震報導的版面、體裁與標題字型大小等三個面向的分析發現，大陸與香港選擇性地報導其中比較重大的事件，將其報導置於相對重要位置；而作為災難發生地的臺灣，所有報紙版面都有相關報導。三地報紙都以純淨新聞為主，但臺灣的報導相對來說較常出現評論，香港報導出現較多專稿與特寫。總體而言，三地報紙的地震報導量在第二周即已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

兩岸三地報紙如何報導 921 臺灣地震？重視程度如何？本研究透過對相關報導的版面、體裁等兩個面向的分析進行比較。

#### （一）報導版面編排的比較

根據報紙版面編排原理，編輯通常把最重要的新聞排在上方，次要新聞排在中間，較不重要的新聞排在下方。一些特別重要的新聞則會採用全版、半版、通欄等特殊編排方式來增強其視覺衝擊力，以引起讀者注目。透過對新聞版面位置的分析，可以判斷新聞在編輯眼裏的重要程度。

根據卡方檢定結果（詳見表四），三地報紙對臺灣地震報導版面位置的編排有顯著差異（ $\chi^2 = 114.9, df = 6, p < .001$ ）：香港報紙



(16.1%)比大陸(2.2%)與臺灣(2.3%)的報紙較傾向於使用通欄等特殊編排方式以突出地震報導；大陸報紙(45.3%)則比香港(14.3%)與臺灣(32.3%)更傾向於把地震報導排在版面上方；臺灣報紙的地震報導編排則較平均，出現在版面上、下方與中間者皆佔三分之一左右。造成差異的原因，可能在於大陸與香港報紙並沒有像臺灣報紙那樣密集地報導地震及地震引發的一系列事件，而是有選擇地報導其中較為重大的事件，這些事件的顯著性使得編輯在考慮版面編排時將其置於較為重要的位置。臺灣報紙因為相關報導量大，不可能將所有地震報導都置於重要位置，故出現地震報導在上、中、下三版面位置近乎三足鼎立的現象。

表四：兩岸三地報紙 921 地震報導版面編排之比較 (%)

版面位置	三地報紙			合計 (N = 1,035)
	大陸 (N = 137)	香港 (N = 217)	臺灣 (N = 681)	
上	45.3 (62)	14.3 (31)	32.3 (220)	30.3 (313)
中	40.1 (55)	45.2 (98)	33.6 (229)	36.9 (382)
下	12.4 (17)	24.4 (53)	31.7 (216)	27.6 (286)
特殊編排	2.2 (3)	16.1 (35)	2.4 (16)	5.2 (54)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chi^2 = 114.9, d.f. = 6, p < .001$				

註：括弧內的數字為頻數。

## (二) 報導體裁的比較

體裁也是表現新聞重要程度的方式。「純淨新聞」是最常用的報導體裁，故此類體裁的運用不能算是表現新聞重要程度的重要手段，仍需借助版面位置與標題字型大小。「特寫或專稿」由於在寫作手法上比純淨新聞更為靈活自由，可深入刻畫細節，常用於深度報導。一般而言，使用「特寫或專稿」體裁報導，表現重視新聞的程度也較高。「評論」的使用亦同，通常會出現在具重大意義、帶有普遍或典型性的新聞事件或人物上。因此，本研究對報導體裁的分析也將依此來判斷新聞的重要程度。

由表五的卡方檢定可看出，雖然三地報紙對臺灣地震的報導皆有七成以上為「純淨新聞」，但在體裁上仍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 $\chi^2 = 95.85, d.f. = 6, p < .001$ )，特別是在「特寫或分析稿」與「評論」這兩種體裁的使用。大陸 (10.2%) 與香港 (18.0%) 報紙的地震報導皆以

表五：兩岸三地報紙 921 地震報導體裁之比較 (%)

新聞類型	大陸 (N = 137)	香港 (N = 217)	臺灣 (N = 698)	合計 (N = 1,052)
純淨新聞	78.8 (108)	78.8 (171)	73.2 (511)	75.1 (790)
特寫或專稿	10.2 (14)	18.0 (39)	3.9 (27)	7.6 (80)
評論	0.0 (0)	3.2 (7)	10.5 (73)	7.6 (80)
其他	11.0 (15)	0.0 (0)	12.4 (87)	9.7 (102)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chi^2 = 95.85, d.f. = 6, p <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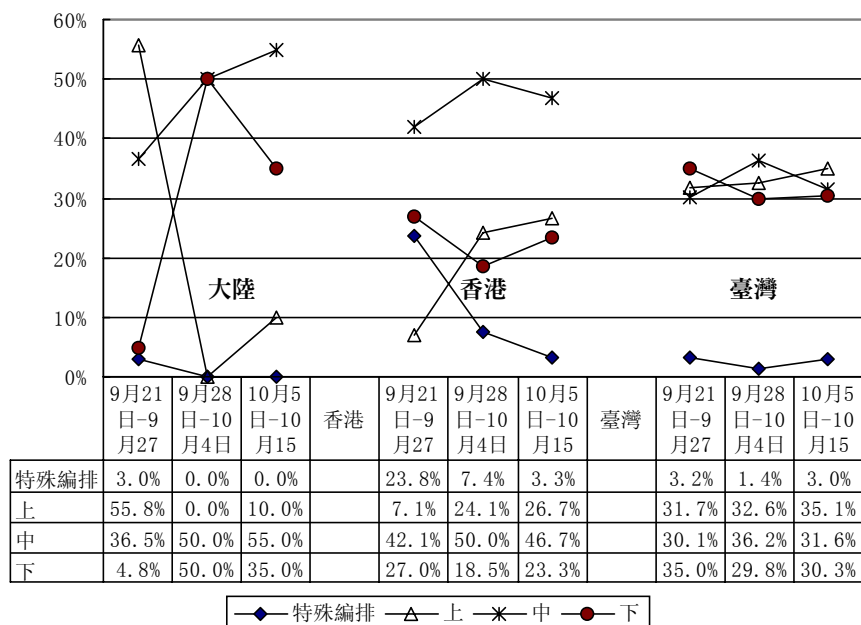
註：括弧內的數字為頻數。

「特寫或專稿」為輔，但大陸報紙則無「評論」。臺灣報紙的地震「評論」體裁（10.5%）的運用比例高於大陸與香港媒體，對「特寫或專稿」（3.9%）的運用則低於大陸與香港。

### （三）報導形式的變化

前文提到，Singer 與 Endreny（1993: 22-23）等研究者曾經發現，災難事件報導數量在短時間內銳減之因在於事件無更新進展，新聞媒體騰出時段或版面以報導更有新聞價值的其他事件或追逐更新鮮的新聞話題。若此，媒體對災難新聞的報導形式是否也會隨著對災難事件關注度降低而發生變化呢？這裏仍以震後第一至三週三個時段，對三地報紙地震報導的形式加以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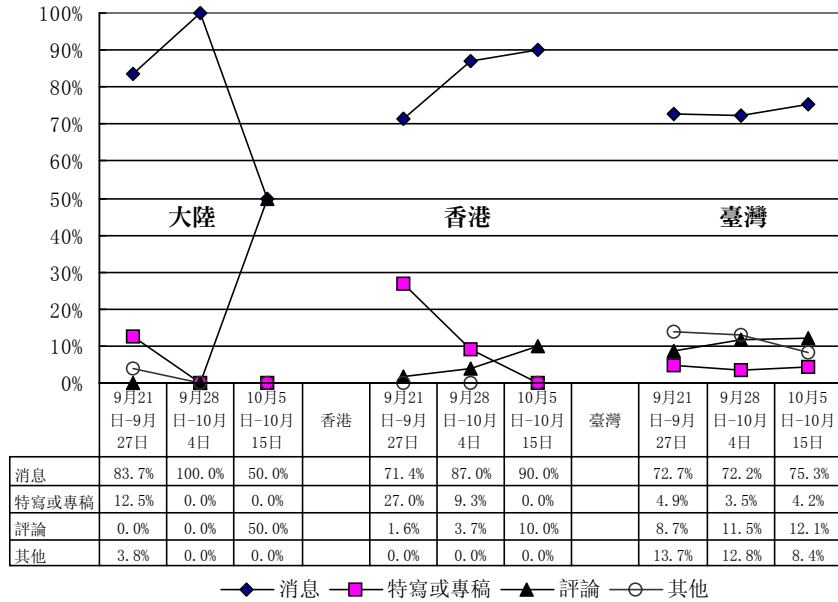
一如圖四由三地地震報導的版面位置變化來看，大陸報紙對地震報導的版面編排隨時間變化而異：震後第一周的地震報導大都排在上方，並有全版、半版、通欄等特殊編排，而震後第二、三周的地震報導大都排在版面的中間與下方，顯示了大陸的地震報導在第二周後很少再被視為重要新聞處理。香港報紙之地震報導版面位置變化與大陸類似，震後第一周地震報導通欄採用的比例較高，但第二周起即顯著降低。即便如此，香港報紙卻將較多報導編排至版面上方，顯示其對地震報導的重視程度要比大陸報紙為高。此外，臺灣報紙對地震報導的版面編排在震後三個星期則沒有明顯變化。



圖四：兩岸三地報紙 921 地震報導版面的變化

註：此圖與圖五對三地地震新聞報導版面、類型之比較都以列百分比進行比較。列百分比的定義為：該地報紙某時段內使用某個報導形式的地震報導數量佔該地報紙該時段地震報導總數的百分比，藉此可看出該地報紙某一時段的地震報導採用何種報導形式最多。

圖五則呈現報導類型的變化。我們發現，震後第一周大陸與香港報紙採用「特寫或專稿」的報導類型比例較高，第二周和第三周採用的比例較低，臺灣報紙各種報導類型的採用比例在震後三周內則幾乎沒有變化。



圖五：兩岸三地報紙 921 地震報導類型的變化

綜上所述，三地報紙的地震報導報導形式隨時間推移發生變化：震後第一周都採用加大標題字型大小、放置在重要位置、增加特寫或專稿或評論等方式加以凸顯其對地震報導的極大重視。然而從第二周開始，大陸與香港報紙採用上述方式的比例開始降低。這些變化是否與災後事態的發展，以及事件與當地後續處理有關？或是新聞媒體本身追逐新鮮事物的特性所致？抑或受公眾對地震報導的需求所影響？這些問題很難僅透過內容分析回答，尚需結合當時的事態發展、對相關報導的文本分析、對公眾的調查等其他資料加以佐證來了解，因而點出了未來災難事件報導相關研究可進一步延伸之處。

## 伍、討論與延伸思考

透過對三地報紙 921 地震報導的比較，本研究發現三地報紙地震報導在絕對報導量的變化有所差異：香港與大陸報紙的地震報導在短期內銳減，而臺灣報紙的降幅則小得多。此外，三地報紙地震報導的相對報導量都隨時間推移而下降，且都在震後一段時間內保持平穩後突然下降。不同報紙突降發生的時間並不相同：《北京青年報》發生的時間最早，為 1999 年 9 月 25 日；其次是《人民日報》，為 9 月 27 日；再次是香港《明報》與《東方日報》，為 9 月 28 日；最後是臺灣的《中國時報》和《自由時報》，為 9 月 30 日。

在這些發現基礎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幾點供進一步思考與討論：首先，如果用絕對報導量來分析，則香港與大陸報紙地震報導量的變化規律與 Singer 與 Endreny (1993) 的研究發現一致，而臺灣報紙的變化則不一致；若用相對報導量分析，則三地報紙地震報導的變化規律與 Singer 與 Endreny (1993) 的研究發現都不一致。有鑑於此，本研究認為 Singer 與 Endreny 的研究結論尚需加上對接近性與媒體新聞報導的容量大小等變項考量，用相對報導量比較不同媒體對於災難事件的關注度可能更為妥當。

其次，本研究發現三地報紙的相對報導量都出現「突降點」，是否意味著所有媒體的災難報導具有共同規律，其突降點的日期與災難發生日期的間距會受到某些因素影響？或與災難影響大小成正比？如大陸地震報導突降點早於香港和臺灣，這究竟是受到中秋、國慶兩大節日報導的影響，還是由於地理接近性所致，有待進一步研究。

本研究發現：在三地報紙地震相對報導量減少的同時，三地報紙對

地震報導的重視程度也下降，表現為排在重要版面的地震新聞數量減少，似也說明地震相對報導量與表示重視程度之版面位置、報導體裁等相關。本研究並未深入探討此點，後續研究或可將每日災難新聞報導形式加以量化並取平均值（包含對災難報導的重視程度），以檢驗此平均值與災難報導相對報導量的相關程度，藉此瞭解災難報導的重視程度與相對報導量間的關係。

對三地報紙地震報導的主角與主題的比較分析發現，香港報紙的地震報導平均每則報導出現兩個以上的主角與主題，高於大陸與臺灣。多報導主角與報導主題的現象究竟僅是香港報紙對此次臺灣地震報導所表現的特點，抑或其所有新聞報導的共同特點，值得三地新聞報導之比較相關研究進一步探索。

由危機傳播角度來看兩岸三地對本研究所分析的 921 地震報導可知，由於三地受災之影響不同，媒體在蒐集真相、儘速報導方面亦有不同表現。但由於三方媒體與受眾對災難的不同心理距離，使得三方媒體對所報導的「事實真相」各有偏重：大陸媒體由於未直接受到地震災害，故偏重於提供「災情」及其「原因與影響」的「解釋」報導；香港媒體則對災情的細節與受災者更為關注。臺灣因係災難發生地，對「慰問與救災」最為偏重。此一現象提醒我們，雖然在危機傳播討論中有些共通原則，但不同文化情境之受眾因有不同的關注與需求，故報導內容也需因具體條件而調整，以衡量媒體有效達到危機傳播的效果。

基本上，危機傳播原則在於強調避免持續大量且負面的報導，因其易使媒體資訊模糊混亂，更易引起公眾負面情緒。為了有效預防災害的損失，危機傳播策略中也應更為重視媒體，並在相關報導中採取清楚而有同情心的披露策略。就危機發生地的媒體而言，由於災難影響較為長期，故持續控制議題，並視民眾需求的變化來提供相關資訊，乃屬當務

之急。

延續上述發現，我們不妨由兩岸三地媒體於政治與文化上的異同點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三地媒體除了都重視新聞的基本報導原則進行及時且全面之災情報導，且也都基於血脈相連而強調對災民與救災的關注，如非災害發生地的大陸與香港媒體在報導中俱都報導了該地對臺灣的賑災援助工作。此外，由於華人文化傳統之政治因素在社會生活中一向扮演重要角色，我們亦發現三地媒體都普遍重視對「黨政官員、機構」的角色，並加強其有關「慰問與救災」的功能。

若從三地差異來觀察，香港媒體基於歷史因素，處於特殊的中西文化交會環境，故在新聞報導上吸收了西方媒體災難報導的傳統，如議題的選擇傾向「反常」與「衝突」（張威，1999）；地震的災禍面向即為一例。另在報導手法上，香港媒體總在搶先簡要報導主要事實後，順著深入追蹤報導的傳統，達到如李秀芳（2004）所提之全方位使用、多元管道報導並預測災禍發生的原因、背景與後果等，且在報導中重視受災者的情感、命運與生存狀態。同時，香港媒體也傾向於受西方所影響的「自由而有責任的報紙」此一輿論監督傳統，重視報導的揭弊與批評，即如張威（1999）所言之「批評政府、揭露醜聞的報導始終是負面新聞報導中的主旋律」。

至於大陸的新聞媒體則由於政治原因，對臺灣的報導管制較為嚴格，各媒體一般皆以新華社與《人民日報》的宣傳口徑為主。不過我們卻發現，大陸媒體對臺灣 921 地震的天災報導反而突破了前述的政治因素，主要原因可能有下：首先，1999 年臺灣地震發生時已臨近澳門回歸，從官方宣傳工作的角度來看，此時對臺灣災民生存狀況的關注、對災情與救災工作、災害原因及影響的報導，必然會顯現相當的重視。此外，由於大陸媒體必須迴避對臺灣政府及其相關機構過於強調，所以對



社會團體、學術機構、工商企業的報導比例反顯得較高。

相對而言，身處災難發生地的臺灣媒體報導則體現了對突發事件較強的適應與處理能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從其他臺灣學界對 921 地震報導的相關研究或檢討可發現（如蘇蘅，2000），臺灣媒體在這次災難事件中反映出華人傳統中政治權力對媒體的「監管」，而忽略在突發危機時對媒體規律的理解與把握，以致出現政府與媒體之溝通不足（臧國仁、鍾蔚文，2000: 143-151）。蘇蘅（2000）便指出：

「政府似不了解不同媒體的特性，也不清楚媒體競爭新聞、求好心切的本質，更忽略作為社會神經網絡的媒體，在災變中必須與社會脈動緊密相合，從頭到尾關注政府及各界的救災行動，並持續對後續龐大資源的配置保持高度警覺，才能發揮看門作用。媒體並非只為政府部門服務，政府絕不可以高壓或父權心態看待媒體作為，如此才能讓社會大眾看清災情各個面向，有助記取教訓」。（p. 160）

孫曼蘋（2000）則建議：

「向來把媒體視為工具性功能的行政體系，似乎到了該全面檢討政府處理公共事務的策略的時候了。至少，是否該重新思考從新聞局以降各機構的公關部門定位如何？發言人定位如何？媒體特性及真正需求又是如何？」（p. 170）

本研究在研究設計與方法上仍存在以下遺憾、不足與待改進處，在此提出以為本文結語：

第一，報紙選擇上的考慮可能不是最佳，如將大陸的《人民日報》換成另一份商業化程度高的報紙，則三地報紙的可比性可能會更強；

第二，由於研究經費與研究條件之限制，本研究採用了單一方法，

僅以報紙為研究對象來進行內容分析，難以深入了解災難報導是否滿足當地受眾的資訊需求。如果兩岸三地的學者能夠聯手，結合內容分析、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等方式來研究災難報導，無疑將更能深入地透過媒體對災難事件的報導探討其傳播功能與社會責任。

第三，僅僅研究三地報紙對 921 地震的報導，似仍難以揭示三地報紙對災難事件報導的特殊規律。由於 921 地震發生在臺灣，三地報導的差異很大程度都來自於接近性的影響。對三地報紙災難性事件的報導進行比較研究，似應排除接近性的影響，而以三地都發生的災難性事件更為妥當，如 2003 年發生在兩岸三地的 SARS 事件就是一個極好的研究題材。退而求其次，以未發生在三地卻為三地共同關注的災難事件作為研究對象，此類災難事件遠者有美國 911 恐怖襲擊事件，近者有伊拉克戰爭。且若以發生在三地中某地的災難事件報導為研究對象，為了消除接近性引起的差異，最好能同時研究發生在另一地並有同樣影響的災難事件報導。1998 年中國大陸洪災與 921 臺灣地震時間接近，前後僅差一年，影響力也相當，如果能同時對三地報紙對 1998 年大陸洪災的報導進行內容分析，則研究結果也會更具說服力。

## 註釋

- 1 本文得以完成，作者感謝臺灣周祖誠先生協助郵寄、複印與提供大量參考資料；香港城市大學祝建華教授及其研究生譚躍則協助完成香港報紙的抽樣與編碼；中國傳媒大學碩士生陳曉華、田卉與安琦完成臺灣與大陸報紙的編碼工作，博士生馬廣斌則於論文修改階段提供大量寶貴意見，並補充部分文獻資料。《新聞學研究》匿名評審所提出的中肯意見和建議，在此也一併致謝。

- 2 在 2000 年，《大陸、香港、臺灣輿論機制的個案研究—對三地主要報紙關於「臺灣 921 大地震」的內容分析》課題，獲中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批准立項。
- 3 見 <http://odphp.osoph.s.dhhs.gov/pubs/prevrpt/Archives/95fm1.htm>
- 4 1998 年 6 月至 7 月，「聖嬰」現象的強大暖濕空氣為中國大陸帶來強大雨勢，長江上游先後出現八次洪峰、並與中下游的洪水遭遇，形成全流域型的大洪水；同時東北松花江、嫩江流域，華南珠江、閩江流域也氾濫成災。大陸共有 29 個省、市、自治區遭受這場無妄之災，受災人數上億，死亡 4,150 人，農田受災面積 2,229 萬公頃（3.34 億畝），倒塌房屋 685 萬間，直接經濟損失 2,551 億元。江西、湖南、湖北、黑龍江、內蒙古、吉林等省（區）受災最重，洪災、抗洪救災與災後重建成為當年媒體報導的話題，相關新聞也成為學界研究的焦點。
- 5 臺灣兩大報系在此指的是《中國時報》與《聯合報》。
- 6 通欄指橫排報紙中標題或文章橫貫各欄。做通欄處理的新聞重要性僅次於全版與半版。
- 7 下文若無特別說明，則提到報導量時均指絕對報導量，即某類報導的則數。

## 參考書目

- 〈金庸和他的《明報》〉。上網日期：2003 年 3 月 17 日，取自「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22114/26470/26501/1751602.html>  
人民日報編輯部（1998）。〈為抗洪鬥爭提供強有力的輿論支援—人民日報抗洪搶險宣傳報導總結〉，《新聞戰線》，10: 4-8。

- 王石番 (1991)。《傳播內容分析法—理論與實證》。臺北：幼獅。
- 肖小穗 (2002)。〈好心沒好報？—由地震救援行動引發的跨社群面子爭論〉，《新聞學研究》，73: 95-129。
- 李秀芳 (2004)。〈透視西方災禍報導的特色〉，《國際新聞界》，3: 24。
- 杜駿飛、胡翼青 (2001)。《深度報導原理》。北京：新華。
- 周朝榮 (1999)。〈抗洪救災攝影採訪得失談〉，《新聞與成才》，3: 16-18。
- 胡幼偉、陳嘉彰 (2002 年 7 月 5 日)。〈2001 年颱風新聞報導型態解析：兼論災難新聞的社會責任〉。取自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頁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EC/091/EC-R-091-019.htm>
- 翁秀琪 (1993)。《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臺北：三民。
- 孫曼蘋 (2000)。〈921 地震政府體系資訊傳佈之初探〉，《新聞學研究》，62: 165-170。
- 孫發友 (2001)。〈從「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國災害報導觀念變化分析〉，《現代傳播》，2: 33-37。
- 陳鳳如 (2001)。《我國報紙對重大災難新聞報導之研究—以九二一大地震為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所碩士論文。
- 張述亞 (2002)。《災難新聞報導初探》。廣西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碩士論文。
- 張威 (1999)。〈中西比較：正面報道和負面報導〉，《國際新聞界》，1: 48。
- 張勇 (1999)。《當代中國災害報導研究》。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論文。
- 張毓麟 (2003)。〈臺灣報業三大報的壟斷及反思〉 (2003 年 4 月 7

- 日)。《新聞記者》，242。取自「中華廣告網」  
<http://www.a.com.cn/cn/mtyj/mtdcyj/2003/0304074.htm>
- 曹麗坤、程秋（2000）。〈關於重大自然災害深度報導的思考〉，《理論觀察》，1: 80-81。
- 臧國仁、鍾蔚文（2000）。〈災難事件與媒體報導：相關研究簡述〉，《新聞學研究》，62: 143-151。
- 劉一平（2001）。〈試論九十年代中國災難報導機制〉，《新聞大學》，1: 245-47。
- 劉勁松、劉偉（1998）。〈從 98 抗洪報導談災害新聞的採訪與寫作〉，《新聞傳播》，6: 18-19。
- 鄧利平（2001）。《負面新聞資訊傳播的多維視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論文。
- 蘇蘅（2000）。〈集集大地震中媒體危機處理的總體檢〉，《新聞學研究》，62: 153-163。
- 顧理平（2002）。《社會新聞採寫藝術》。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 樂軼玫（1997）。〈關於災難新聞報導的角度選擇〉，《中國廣播電視學刊》，12: 63-64。
- Chartier, J., & Gabler, S. (2001). *Risk communication and governme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 for the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Retrieved from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CFIA) Web site: [http://www.inspection.gc.ca/english/corpaffr/publications/riscomm/riscomm\\_ch2e.shtml](http://www.inspection.gc.ca/english/corpaffr/publications/riscomm/riscomm_ch2e.shtml)
- Kreps, G. A. (1980). Research needs and policy issues on mass media disaster reporting. *Committee on disasters and the mass media* (pp. 35-74).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McClure, J., Allen, M. W., & Walkey, F. (2001). Countering fatalism: Causal information in news reports affects judgments about earthquake damage.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3(2), 109-121.
- Moore, H. E., & Williams, E. R. (1958). *The newspaper tells the story of tornadoes over Texas: A study of Waco and San Angelo in disaster*.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Nigg, J. M. (1982). Communic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uncertainty: Understanding earthquake forecast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2(1): 27-36.
- Nimmo, D., & Combs, J. E. (1985). *Nightly horrors: Crisis coverage by television network news*. Knoxville, TN: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 Oda, S. (1996). The role of broadcasting media in providing disaster-related news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of Broadcasting*, 32, 33-57.
- Singer, E., & Endreny, P. M. (1993). *Reporting on risk: How the mass media portray accidents, diseases, disasters, and other hazard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Yankelovich, D. (1991). *Coming to public judgement: Making democracy work in a complex world*.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A Study on the Disaster Reports of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 Taking News Reports on Taiwan's 921 Earthquake for Example

Huixin Ke, Lai Liu, Chuanyan Zhu, Zhou Chen, Jun Nan\*

## ABSTRACT

With the method of content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reports during the period of Taiwan's 921 Earthquake on the earthquake and relevant news in six newspapers from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It finds that attention paid to the earthquake in the three areas kept on somewhat consistently changing when measured by the relative amount of reports, while it changed differently when measured by the absolute amount of reports. Moreover, newspapers in the three areas saw their focuses and forms of reports change along with time, but in a different way. This paper tries to research the indices measuring the change of media's focus on disasters.

**Keywords:** report on earthquake, disaster, crisis communication, content analysis

---

\* Huixin Ke is Professor at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 i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Beijing, P.R.C. Lai Liu is Research Manager of the Lenovo Group, Beijing, P.R.C. Chuanyan Zhu is Research Manager of Sinomonitor International, Beijing, P.R.C. Zhou Chen is Analyst Researcher of China Mainland Marketing Research Company Limited, Beijing, P.R.C. Jun Nan is Assistant Editor, Xinhua News Agency, Beijing, P.R.C.

• 新聞學研究 • 第八十五期 民 94 年 10 月